



中

华

学

术

精

品

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

[美] 汪荣祖



中华书局

中华学术精品

史 传 通 说

——中西史学之比较

〔美〕汪荣祖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美)汪荣祖著.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
(中华学术精品)
ISBN 7-101-03602-3

I. 史… II. 汪… III. 史学 - 对比研究 - 中国、
西方国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885 号

原版责编：姚景安

新版责编：高 天

中华学术精品

史 传 通 说

——中西史学之比较

〔美〕汪荣祖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 1/4 印张·232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新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101-03602-3/K·1514

出版说明

顾名思义，“中华学术精品”所要奉献给大家的，是中华书局所出学术著作中的精品。中华书局创建已逾 90 周年，一直致力于服务大众、传播文化；尤其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华书局成为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便是我们多年来奉行的宗旨，几代中华人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仅出版了大量一流的古籍整理著作，而且推出了一批批高水平的学术精品，在文化和学术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华的书，素以高品质声誉于学林；书局也因此被学人目为学术的殿堂。值此 90 华诞，我们从历年所出学术著作中遴选出最具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计划分辑陆续推出，以飨读者。一方面这是对以往所做工作的回顾和整理，另一方面我们也欲借此表达对多年支持中华书局工作的老作者的怀念和感激。

这套“中华学术精品”所要推出的，堪称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者包括：顾颉刚、汤用彤、熊十力、张岱年、于省吾、王仲荦、唐长孺……每一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响亮的名字，蜚声海内外。中华之所以能成就为学术殿堂，就在于长期以来汇聚了这样一批一流的作者，得到了他们的真心支持。他们的著作，曾启发、滋养了一代乃至几代学人，在时间的检验中，成为经典。我们将他们在不同时期出版的经典之作搜集起来，集中再版，因为我们深信，这些作品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好的方式得到

保存；同时，它们也理应以新颖的面貌、以更便捷的方式为新一代学人所接触、拥有，从而惠泽后学、尽其所用。我们的工作，意在为存续学术传统、开启新学尽一份力。

在世纪之交，对近现代中国学术从不同角度进行回顾、整理，成为一股潮流。不少中华推出的大家名著，已被收入各种文丛、文集中重新出版，不难找见。因此，我们首先推出的“中华学术精品”第一辑，着眼于确有重版价值，而且目前坊间又较难找到的著作，以应读者急需，方便后学。我们尽量采用了较靠后的修订版，重新进行了录排，并作了统一的装帧设计。至于内容，除个别作品由作者进行了较大修订外，大部分未做改动，只是为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统一为简体横排。

这里是总结，也是开端，我们会秉承“弘扬传统，服务学术”的一贯宗旨，继续努力，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中华学术建设尽力，希望得到海内外学人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年12月

凡 例

- 一、本书寻刘勰史传旧踪，旁测侧探，参证今古中外，随心廣扬，聊曰通说，非注刘释刘之作也。
- 二、钱先生默存视我为友，实我师表；赐我佳序，著我微意。诚作者之光宠。杜维运学长专治中西史学，卅年如一日，承其审阅全稿，更蒙惠序，盛情永志。
- 三、全篇分述廿四章，凡有征引咸注明出处，引言以“ ”号表之。可发深思之译文，附录原文，以资参照。初见之西人姓氏，附以原文；重见者仅示译名。篇末附译名对照表，以利覆按。章末或见附说，以资申论之需。
- 四、各章附注，明示引用之作者，及其书名卷册页数，以便读者速检。卷末征引书目分中日文与西文二部，以姓氏或书名字母序，并详示出版时地，以便查阅。参考而未征引者不备录。
- 五、书目之后，附以索引，以人名为主，便于读者按图索骥也。
- 六、兹编之作，譬如蠡测汪洋，所得涓滴，岂沧海之比？夫中西史学，渊源俱长而流变殊途，诚不可横施甲乙；惟宜平心索解，窥其底蕴，观赏异趣耳。至于殊语壹义，貌异心同者，并非偶然。盖文化有异，情理可通，若直笔信史，史之悬鹄，东海西海固无异辞也。

钱序

古之常言，曰“良史”，曰“直笔”；其曰“不尽不实”，则史传之有乖良直者也。窃谓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积材愈新，则久号博稽周知之史传变而为寡见阙闻矣。着眼迥异，则群推真识圆览之史传不免于皮相畦执矣。斯所以一朝之史、一人之传，祖构继作，彼此相因相革而未有艾也。刘彦和《史传》一篇稍窥端倪，刘子玄《史通》穷源竟委，慎思明辨，卓尔成一家言，后来论者，只如徐闻。海通以还，吾国学人涉猎西方论史传著作，有新相知之乐，固也，而复往往笑与抃会，如获故物、如遇故人焉。吾友汪君荣祖通识方闻，贯穿新故，出其绪余，成兹一编。于中外古今之论史传者提要钩玄，折衷求是，洵足以疏瀹心胸，开张耳目，笔语雅饬，抑又未已。余受而读之，赏叹之不足，僭书数语于简端。

钱锺书

丙寅九月

古文常言，曰「良史」，曰「直筆」；其曰「不盡不實」，則
此傳之有乖良直者也。竊謂求盡則盡無止境，
責實則實無定據。^指積材愈疎，則號稱博稽周知
^之_{更詳}而為審見闕聞矣。著眼^{迥異}，則群推真
譜圓覽之^{更詳}，不免於皮相唯執矣。^故所以一朝之
史一人之傳，粗構總作^{彼此}，^布相因相革而未^以他也。劉秀
和壁傳^舊，稍窺端倪，劉李玄公史通^舊，窮源竟委，慎思
明辨，卓然成一疾言，後來論者，被如鍊闇。上海通以
還，吾國學人涉獵西方^傳著作，有新相如之
樂^{笑與博益}，^固不待^也，而復往往如獲故物、如遇故人
之^喜。吾友汪君榮祖通識方聞，貫串新
故，出其繙錄，成^故二編。於中外古今之倫史傳
者，探囊鉤玄，折衷求是，洵足以疏濶心胸，開張耳目，
筆語雅饒^{却失本}已。余深而讀之，賞歎^忘足，簪書數
倍於簡立端，錢鏗盡，丙寅九月。

钱序原迹(影印)

杜 序

刘彦和于第六世纪初期，写成《文心雕龙》五十篇，以瑰丽之辞，剖析文章利病得失，体大而思深，论辟而议精。近世所谓文学批评，必以此书为大宗焉。刘彦和亦精于史学，其《史传》一篇，扬榷史籍，探究史理，若隐现刘子玄《史通》之缩影。其云“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世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迄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贏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简约文字中，于史籍之内容，史笔之抑扬，史法之要删，史任之重大，一一出以精见，虽至中西史学大通之今日，其见仍不可废。然则彦和之史学为不可及矣。

吾友汪荣祖兄，醉心史学，于中西史学之会通，尤致深意。近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立二十四题目，通论中西史学。其彰善瘅恶、百氏千载、铨评、贯通、史任诸目，尤为功力所萃。举凡中西史学之大脉络、大关节，皆经指陈分析，而精见亦随之而出，中西史学之异同亦现。“融通中外，参验古今”（见《史任》第二十四），荣祖兄所悬之鹄的至高，其志趣气象可见。今其书问世，有不

令人欢欣鼓舞者耶！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西文明系焉。平心比较两者，论其异同，究其短长，为当今学术之大工作。以宽广之胸襟，会通两者，取其折衷，则世界性新史学所从出之途径。然则凡专崇中国史学或独宗西方史学者，其皆流于方隅之见欤！

与荣祖兄相交三十年，以兴趣相投，每相见，辄恨日短。今其大著梓行，嘱我为之序。夫我岂能序荣祖兄之大著者？僭越之嫌不避，亦即以志学术之深交也。惟幸大雅教正焉。

杜维运

戊辰初春

目 次

凡例	1
钱序	1
杜序	3
载籍第一	1
记事记言第二	7
彰善瘅恶第三	12
春秋第四	23
左传第五	31
战国策第六 附说 史传与传奇之辨	44
太史公第七	54
传记第八 附说 传记之信与雅	78
班固第九 附说 班马异同说	89
后汉诸史第十	101
陈寿第十一	112
晋代之书第十二	124
百氏千载第十三	132
盛衰第十四	140
石室金匮第十五	148
铨评第十六 附说 论褒贬不能自见	155
总会第十七	174

铨配第十八	184
信史第十九 附说 疑古辨	192
记编同时第二十	203
素心第二十一 附说 史笔与诗心	210
直笔第二十二	217
贯通第二十三	222
史任第二十四	232
征引书目	255
译名对照表	303
索引	311

载籍第一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载籍”(Records)者，文字之记录，史之始也。载籍之前，太古茫茫，纵有人事，亦如“去岁湖上之风，既逝矣，渺难追寻”^①。后人考古，偶拾“遗迹”(Remains)，乃知“史前”(Prehistory，或Antehistory)。故史前所据者，乃古人所遗之实物，诸如器械、屋宇、庙堂、墓葬、壁画之属，皆为“无声之证言”(the mute, silent witness)。致力于史前遗迹者，即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是也^②。考古可为历史佐证，然无能取而代之，且史前史久已自立门户，别辟蹊径，与史学固多异趣存焉^③。

既有文字而后有史，《礼记·曲礼》所谓“史载笔”，诚不易之语。南史执简以往，所以笔之于简也。许慎释史曰：“记事者也”^④；章太炎曰史“记簿书也”^⑤；王国维以“史为掌书之官”^⑥；徐子明谓史

① 此英国史学名家巴特菲尔德(Sir Herbert Butterfield)之言，全句谓：“Bygone events were like the pattern of last year's wind on the surface of a lake – not things which one could feel were really capable of recapture.”见氏著《史源》(*The Origins of History*)，p.17。

② 参阅丹尼尔(Glyn Daniel)，《史前史释》(*The Idea of Prehistory*)，pp. 12–13。

③ 详见同上书第七章。李济以考古实物为真实之史，文字记录为想像之史，显属一偏之论，近人已有评骘，阅杨懋春，《史学新论》，页139–152。

④ 许慎，《说文解字》，页65。

⑤ 章太炎，《文始》，卷7，页148。

⑥ 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页269。

字既从又持中，“又者手也，中者有所持也；古时无笔，用刀书之”^①；金毓黻则谓：“保藏之档案谓之中，侍中之人谓之史。”^② 众士同声，咸以史由笔载。史之于载籍，若形之于影焉。历代更以书、志、简、册为史之异字，直以史即载籍矣。泰西亦以“载籍乃史事之所赖”(Ne quid falsi audeat)。希腊史字，原作 *ωτοργα*，训为调查研究之意。西方史家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ca. 484 – 425 B. C.)作《波希战纪》(*The Persian Wars*)，即其调查之报告，包罗万象，且有得自旅行见闻者。迄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 ca. 198 – 120 B. C. or 200 – 118 B. C. or 198 – 117 B. C.)始以史(The Histories)名其载纪，自此史书同义，世代罔替。德文史字 *Geschichte* 虽别具史实、求真之旨，仍以载籍(Gescheinis)为重。法文 *Histoire* 亦近似。唯英文 *History* 作故事解，仅得皮相尔。

吾华载籍之富，举世无俦。郑鹤声曰：“我国史学发生之早，典籍之博，学者之注意，实可谓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③，诚非虚言。盖西土论师亦乐道中华册藏之盛^④，若谓：“其持续之久，数量之宏，堪称特色”(Unique in the volume of its output and the length and continuity of its record)^⑤。《隋书·经籍志》初入载籍于史部^⑥，《唐

① 徐子明，《东西史学之异同》，《史学》，2期，页285。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页7。另参阅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页4–7。

③ 郑鹤声，《文献学》，页4。

④ 见施温格(Wager T. Swingle)，《中国历史文献》("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美国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6 (Oct. 1920 – July, 1921), p. 718 谓中国“Show a record such as can be produced by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提供举世无俦之载籍)。

⑤ 皮思雷(W. G. Beasley)和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合编，《中国与日本之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p. 1。

⑥ 见《隋书》，册4，页953。

书》复以史部为乙部，分十三类：正史以纪纪、传、表、志；古史以纪编年系事；杂史以纪异体杂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旧事以纪朝廷政令；职官以纪班序品秩；仪注以纪吉凶行事；刑法以纪律令格式；杂博以纪先圣人物；地理以纪山川群国；谱系以纪世族继序；略录以纪史策条目^①。《宋史·艺文》亦曰史类十三，唯类称略有异同，以“古史”为编年类，以“杂史”为别史类，以“杂博”为传记类，以“略录”为目录类；另删“起居注”、“旧事”，而代之以史钞类、故事类^②。《明史·艺文》约之为十类，以编年入正史类，删霸史、目录二类^③。《清史稿》史部定为十六类，增列纪事本末类、诏令奏议类、载记类、时令类、政书类、金石类、史评类，删刑法类^④。至此旧史类别已备。其中除史料与目录外，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唐刘知几（子玄）已标其二；南宋袁枢，复创其一。子玄复就史家流派约而为六：尚书家以言为主；春秋家以事为主；左传家以鲁为主，专述一国；国语家并列诸国，可称为国别史乘；史记家讲求通史；汉书家尚断代之史^⑤。西方史学，虽无六家，三体俱备。历代史书浩瀚，诚繁而难理，然论体究派，不出藩篱。晚近世变，西潮东至，作史者不崇官修，汰更义法，以史论为尚，甚者以事辅论。新旧载籍之异，可谓至矣。然居今识古，其仍载籍乎？

载籍既存，人类之记忆不因人亡而灭，西人所谓：“史者乃集合

① 见《旧唐书》，册 6，页 1963。

② 见《宋史》，册 15，页 5085。

③ 见《明史》，册 8，页 2377。

④ 见《清史稿》，册 1，页 39—40 目录。

⑤ 参阅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 1，页 1—11。

之记忆也”(History is organized memory)^①。刘知几亦尝谓：“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②斯言诚然！唯载籍识古之阙失亦不可无言。后史记录前史遗闻，考核无从。“学者多称五帝，尚矣！……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③。故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为本纪书首^④。所谓尤雅者，亦多“传闻”(Legends)，难称信史，盖无当时文字记录故也。甲骨出，信史始断自殷商，因见当时文字记录故也。故今之作史者不言伏羲、黄帝，非敢数典忘祖，实信史有其准则，难以假借。甲骨文字虽有重建信史之功，因其残缺，且多卜辞，仍难以据之作史，仅能以偏盖全耳。西周东周文事虽美，而史简时有遗阙，无从详其梗概。清昭梿曰：“周末自麟经绝笔后，记载绝少。至周显王苏、张约纵连横之时，事迹始可追寻，其间缺佚者一百三十五年，顾炎武已详记矣。”^⑤秦灭六国，禁天下书；项羽一炬，上古典籍，不复得见；汉武独尊儒术，百家式微；董卓之乱，散二百年之收藏；永嘉南渡，中原文籍，再遭浩劫；侯景之乱，复毁梁元藏书；黄巢作难，隋唐之搜访经营，又多流失；五代两宋，刻板之术兴，书籍骤增，而靖康难作，馆阁荡然，而南宋收藏则毁于元兵；朱明有《永乐大典》之盛，然李闯入京，宋刻元镌，胥归残阙；清有《四库》，咸同大难，损失又不知几何。古今中外载籍亡佚，何止十之七八，“史家可得而证验者，仅沧海之一粟耳”(He must take whatever testimony is tossed up like flotsam

① 柯曼久(Henry S. Commager),《历史研求》(The Study of History), p.3。

② 《史通通释》，页 126。

③ 《史记》，册 1，页 46。

④ 同上。

⑤ 昭梿，《啸亭杂录》，页 507。

and jetsam on the sea of time)^①。史氏欲据之以探真相，亦汪洋蠡测耳。

或谓既存之载籍，已可称浩繁矣。然古来政教淫威不绝，直书其难也！或以阿谀为实录，真相湮沦；或以曲诬为信史，是非莫彰。约而言之，禹域实录诎于人主者为多，而泰西实录诎于教主者为多，而其效一以污染载籍为功。英师弗里曼(E. A. Freeman)有言：“作史者之释古籍也，容或有误；殊不知古籍或亦有误谬也”(Not only may the historian err in interpreting the witness of records, but the records themselves may either err or lie)^②。盖籍由人载，而人心各异，所见不同，正误不一，况势利所趋，尤难把持，且从来信古阙疑，故三千年，“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③。例不细举，王应麟已言之矣：“《史通》云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又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则武侯事迹，湮没多矣。”^④若然，则吾所识之古，乃他人欲吾识之者，非真识也。

载籍既阙而多疑，近世疑古风炽，诚非无故。“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⑤。甚者以为历史一无可信(Historical scepticism)，盖历史素材不似地质素材之“金是金，银是银”，不容有误^⑥。好古者虑史之将斩矣，遂欲踵武科学，重建“科学之历史”(History as a Science)。英人布瑞(J. B. Bury)于世纪之初(1902)就剑桥讲

① 强森(Allen Johnson)，《史家与史证》(*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p. 44。

② 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历史研究方法》(*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Study*)，p. 122。

③ 崔述，《考信录》，页 13。

④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13，页 7。

⑤ 见胡适致顾颉刚自述古史观书，载《古史辨》，册 1，页 23。

⑥ 例见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册 3，页 408。